

往事如昨

# 咱工人的野营拉练

邢俊岐

上世纪70年代，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干民兵，每年都要定期进行军事培训，和部队一样，也要组织野营军事拉练。

1972年刚过完春节，烟台二轻系统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，共有500余人参加，按照营、连、排、班建制。我们烟台橡胶厂男女民兵共22人参加，分别组成了两个班，隶属三连三排。拉练为期近一个月。在整个拉练过程中，虽然不及部队严格、正规，但也是有模有样。

记得行军的第二天，三连的宫连长、肖指导员安排我班为尖刀班。我们是全连唯一一个全是男民兵的班，任务是为大部队探路打前站，宿营地是栖霞的英灵山。

清晨，我们从福山门楼镇先于连队早半个小时出发。得到了连首长的信任，大家情绪高涨，精神焕发地急奔在沙土路面的公路上，穿行在弯曲陡峭的山林间，不时地向老乡们打探路径，随时用树枝、石块等物做好路标。由于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，心情既兴奋又着急紧张，天气乍暖还寒，在公路急行赶路时已微汗浸身，在山路驻足辨方向时，冷风灌进脖领，忍不住打寒颤。尖刀班相互协作努力，当日15时到达了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，圆满完成了连里下达的任务。

当晚，我们宿营在陵园广场东面的一排平房里，睡在麦秸草打的地铺上。饭后，连部指示我班承担晚间站岗巡逻的任务。

后半夜，我和董龙华被叫醒去换岗，值3点到5点的岗哨。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我俩在营区巡逻了两遍，然后爬上了停在广场上的“解放牌”汽车的车厢。此时，清朗的夜空繁星点点，一弯残月清冷地挂在半空，稍远的山坡上传来阵阵松涛声，白色的石碑若隐若现。近处的狗吠声中，偶尔夹杂着几声狼嚎。我俩在敞篷车厢上冷得微微发抖，心中既紧张又害怕，手中紧握着半自动步枪，警惕地巡视着广场和营区四周，着急地等待着接岗人员的到来。

下岗后，还未等进入梦乡，又被起床号叫醒。人还在迷糊中，就整理完了内务和装备。饭后集合列队完毕，伴着朝阳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行程。

在栖霞蛇窝泊镇宿营时，大队干部和群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我们分别住在老乡家里，秉承着老八路的光荣传统，住下后，争先恐后地帮着老乡清扫院落和街道，为老乡们挑水直到缸满为止。对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来说，居然也学会了在井中打水。一开始，水管在井里左摇右摆，七上八下就是不听使唤，老是灌不满水，急得脸上直冒汗。在老乡的指点下，我们掌握了水管的摆动技巧，终于将满筒水提出井沿担走。

接连部通知，以班为单位包饺子改善伙食，这也是拉练中唯一的一次。我们男女两个班合在一起，到连队的伙房领了面粉、猪肉、白菜回来。随后进行了分工，女同志调馅、包饺子，男同志负责擀面皮、烧火、下饺子。我们借了房东家的家什，灶台、柴火由房东家供给。一时间大伙七嘴八舌，谈笑风生，各显神技。经过共同的劳作，终于饺子出锅，大家其乐融融地饱餐了一顿。

饭后，我们列队到村中的广场集合，观看了公社宣传队为我们和老乡们演出的现代吕剧《红嫂》。

拉练中尤为艰苦的一次行程，是在从驻地到乳山县的马石山区。那天我们三连是全营的后卫连，我班又担任连里的后卫班，由于碰到了特殊情况，当天走了近100华里。

从清晨出发，一路上同志们情绪高涨，各班、各排互相拉着歌，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公路上。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，下午继续行军时，队伍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连日的行军，有人脚上的泡还没有好利索，个别体弱者也未得到很好的休息，致使整齐的队列也不能保持了。特别是太阳落山后，很多人都顾不上纪律的约束，有东倒西歪走路的，有几人相互搀扶着走的，掉队的人员满道都是。这可苦了我们后卫班。我们一边鼓励掉队的，一边吆喝不想走的赶紧起来走，对体弱的也不时地帮他们拿着背包送一段路。到达宿营地时，我们班每人身至少有两个背包，我还多扛了一支半自动步枪，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，连话都懒得说了。

21时左右，马石店公社枣林大队的干部及一众老乡，走出半里多地迎接我们这支疲惫之师，并帮我们携物一同回村。虽然天时已晚，但老乡们依然热情不减地等待在寒风中，像迎亲人一样把我们接回家中。

我和班里的张洪起、董龙华三人分到一家，房东是一对三十几岁的青年夫妻，有两个小孩，他们把珍藏多年的结婚时的被子都拿了出来给我们盖。由于第二天不用出早操，房东叫我们三个人坐在滚热的土炕上，并拿出板栗、花生招待我们。我们边吃边拉呱，直到深夜。

在枣林的两天时间，我们参观了马石山革命烈士纪念馆，听胶东民兵英雄宋忠孔老前辈讲述马石山惨案，讲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。八路军战士掩护解救群众的英雄壮举，老区人民掩护部队干部伤员的光荣事迹，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老区人民对党、对八路军的热爱和感恩之情。

往事并不如烟，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个春秋，我依然怀念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怀念那段深深的工友加战友情谊，怀念咱胶东老乡们的深情厚谊。

乡村记忆

## xi地瓜芽

姜德照

上世纪60年代，每当过了春节之后，大地复苏，农村孩子可玩的田野项目就多起来。与吃有关的活动，大概就只有偷吃生产队的花生种和地瓜母子了。

偷吃花生种是在与大人一起为生产队种花生的时候，那年月孩子缺嘴，趁大人们不注意，抓一把花生种塞到嘴里，花生种都是被浸泡过的，由红变白，软了些，这样好发芽，吃的时候要把泡软的花生的皮(红衣)去掉再塞进口里，也就是孩子们解馋，大人没有吃这个的。至于吃地瓜母子，那就必须细说一下我们老家的xi(方言音)地瓜芽。

地瓜不是下种就能生长出来，种地瓜必须先xi地瓜芽。xi地瓜芽，就是生出地瓜芽的意思。地瓜母子就是用来作为地瓜生芽栽种的地瓜，这种地瓜一般是秋天生产队组织人刨地瓜的时候就选好的，这些地瓜经过优中选优，个头大小比较均匀，一般细长，上面不存在黑斑和瓣伤，适合当地瓜种。这些地瓜先是搬到山上，放进早已挖好的旱井里。

旱井也叫“地瓜井”，即在山里平坦且较干燥的地方，挖一丈余深的竖井，并底侧面挖掘2-3个横洞，地瓜种储于横洞内。井里冬暖夏凉，所以地瓜就能从当年的秋后一直存到来年的惊蛰时节。

我们村东南角有一块很大的地方，属于专门xi地瓜芽的地方，叫地瓜炕，是培育地瓜秧苗的温床。那里向阳、低洼而背风，全村的地瓜炕就集中建在这里。我们村分为三个生产小队，三个生产小队在村外东面各自有自己的麦场，夏收和秋收的粮食上场，都要归到自己的麦场上，在麦场旁边都有看场屋子。三个队的地瓜炕也是分开的，从南到北排列为三列，并排一溜用青灰砖砌起的约一米高、两米宽，长度不限的地瓜炕，就如同家里的土炕一样，炕的内壁采用的是混合麦糠搅和而成的泥浆，然后再用麦秸草与马粪均匀搅拌好，铺垫在地瓜炕的底下，大约有五十厘米厚，用脚反复踩实。

毕竟是露天，地瓜炕的温度比较低，但麦秸草和马粪发暖，这就为地瓜芽增加了一定的温度和养分底子。三列地瓜炕之间是一条通道，能并排走开两个人，每个地瓜炕下面烧火的灶口就在这里，有烧火的地方就有烟道，地瓜炕的烟道与家里的火炕道理一样，地瓜炕中空，里面砌烟道，烟火带着热气在炕里面循环一圈，再从前面用砖垒起的烟囱排出去，烧炕的烟火为地瓜炕保温。

地瓜炕上面铺上从河里运来的干净河沙，就可以在里面种地瓜母子了。种上地瓜母子，上面盖上一层塑料薄膜，然后是一层厚厚的草帘。白天的时候，上午太阳出来了，揭开草帘和薄膜，为地瓜炕洒水，保持地瓜母子周围沙子的湿度；下午太阳西下，就盖上草帘和薄膜，晚上气温降下来了，下面的灶火就开始点起来了。

此时，村里的大人小孩，都把那儿当成风景，天黑了去看给地瓜炕烧火的景象。通红的炉火和人们嘻嘻哈哈的声音，让山村增添了一个热闹的场所。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到这里来，并非单纯看热闹，这里烧煤烧得到处黑乎乎、脏兮兮，没什么可玩的，我们盯的是出过苗后那些地瓜母子。我们挑那些比较硬实的地瓜母子生吃，虽然不如没作母子的地瓜好吃，但也能吃出一些甜丝丝的味道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这也算是一种美味了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地瓜炕早就废弃了，这个地方被村里规划盖上了住宅。可每逢走到这里，我就会想起当年的热闹情景，想起地瓜母子这个童年的美味。



怀故人

安家正教授生前照片

## 没有答案的答案

李秀丽

2010年，因峻青先生，我与原烟台市教育学院的安家正教授结识，当即就被他渊博的学识、坦荡的为人、真挚的情感所打动，颇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从那以后，我们每隔十几天就互通一次电话，主题永远只有一个——如何传播峻青作品、弘扬胶东红色文化奠基人峻青的精神，交流文学、探讨文章、策划活动。他把自费出版的书签名送给我，我把拙文奉上请他修改。作为文学新人，我经常向安教授请教写作中遇到的难题，他不厌其烦，谆谆教导，甚至写成书信让女儿安延送给我。今年2月25日，我打通安教授的电话，电话另一端是他妻子邹淑香教授的声音：“秀丽，老安又住院了。”我知道耄耋之年的安教授身体每况愈下，近来频频住院，不过调理几日就出院了。这一次，邹教授却悄悄说，情况不太好，下不来床了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一直牵挂着安教授，3月4日，我忍不住打电话询问病情，是护士接的。护士说，大叔没有力气说话，让我接的。我坚持让安教授接电话，我在电话里大声喊：“安——教——授，烟——台——的——保——尔，你——要——坚——强——”过了很久，传来安教授微弱的回答：“好！”顿时，我泪如雨下，颤抖着挂断电话。

在我与安教授十几年的交往中，每次打电话，他都声若洪钟，侃侃而谈。有一个冬日，我刚好在外面，接到安教授的电话，他跟我谈起峻青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一直说了50分钟，我的手脚都冻麻了……可是，此时的安教授呢？我不敢往下想了。几天来，一直惴惴不安，就怕接到那个不想接的电话，每天祈祷着，到了晚上就庆幸安教授又熬过了一天，期盼奇迹出现。

奇迹终究没能出现。3月19日，“那个电话”还是来了，安教授的女儿安延告知噩耗。那一刻，我心情极度低沉，为自己失去一位忠厚长者而悲哀，为烟台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名家而痛心！3月21日9时文登殡仪馆，是我尊敬的安教授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刻，从此再无安教授那一声声朗朗的呼唤：“秀丽嘛，你写峻青老的那篇文章，还有个地方得改改……”

安教授出生于教师世家，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，从教于原烟台市教育学院。他一生著书立说，出版40部著作。我曾问他，你一身疾病，药不离身，为何还要笔耕不辍，自掏腰包出版书籍，再赠送他人，而且在封底醒目地写上“只赠不售”？我知道，他患糖尿病几十年，因脑血栓致右眼完全失明（左眼仅余视力0.25）、右耳失聪，常年的医药费，加之自费出书，已经把他的家底基本掏空。面对我的疑问，安教授慷慨激昂，说道：“我虽不是党员，但也受党教育多年，我要在闭眼前，把肚子里的东西还给社会。”安教授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他投入毕生精力践行这一理想。就在上一次住院前，他还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的第40本书出版了，让闺女送给我。我说：“安教授，现在可以串门了，我让儿子拉着我，去磁山看你！”

世事无常，没想到安教授挺过了三年疫情，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愿天堂没有病痛！从此我想请教的文学问题得不到答案了，但是安教授却给了我人生最美的答案：拥抱生活，热情似火。

有时候，我们不能接受死亡，是因为不能接受爱的人离开。但是，有些爱是永远不会离开的，譬如爱安教授的为人、爱他的作品、爱他的灵魂。